

翻译学意义论

谢云才

(辽宁大学, 沈阳 110036)

提 要: 语言意义可谓历史最为悠久的哲学命题, 也是翻译学的基本命题。译学角度的意义就其认识、表现和对策而言, 应完全以翻译科学与翻译实践的需要为依据和依归。从语言哲学视角审视翻译学中的意义问题, 可以让我们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 对翻译的实质、方法以及标准得以全新认识。

关键词: 意义; 翻译; 认识论; 表现论; 对策论

中图分类号: H355.9

文献标识码: A

意义是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 也是翻译学的核心问题, 翻译的实质是语际间的意义对应转换。语言哲学中所谓指称论、观念论、语用论、符号论从各自角度研究意义的真值, 并提出了各自的意义理论; 溯本求源, 借用语言哲学的理论手段, 从翻译学的角度探讨意义与词语、意义与指称、意义与情境等问题, 无疑具有新的方法论意义。

意义是语言中最复杂的现象, 翻译涉及双语, 因而更增加了意义的复杂性。人类语言中蕴涵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意义究竟有些什么特征和功能? 这里涉及到意义的实质问题, 同时也是翻译学意义理论的认识论基础, 包括意义的认识论、意义的表现论和意义的对策论。

1 意义的认识论

所谓意义的认识论, 即对意义认识规律的发掘与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非常复杂, 基本特征也见仁见智。从译学角度审视语言意义, 实际上我们无法对意义作所谓定量与定性分析, 无法为词语概念划分出某种“泾渭分明”的界线: 意义不是自然科学规律, 是人文现象, 它与概念、语境、意向、文化背景、审美等诸多动态因素密切相关。有鉴于此, 译学角度的语言意义应该具有下面三个特征。

1.1 疏略性

所谓“言之有物”表示意义的质实性, 言之无物当然毫无意义。然而, 意义同时又是疏略的, 并不具备精确入微的描写能力, 因为人的思维虽然可以是“非线性的”, 但语言必须是线性的, 语言必然匮乏与思维同步的多维描写能力, 所谓“语言有时无法表达”便是这种差异使然。俄语中有一句关于咖啡的广告词 *С праздничным вкусом*, 若想译成汉语要费些脑筋哩。

1.2 非确定性

非确定性是确定性的相对概念, 这是意义特征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从译学来看, 意义的确定性是可译性的依据, 非确定性来自于意义的模糊, 则是可译性的限度。

意义的非确定性无处不在，这是由于不同语言对“世界图景”的描述在方式与角度上并非完全相同。如 чудеса в решете，光凭字面指称难以定夺其意义；同理，“愁肠寸断”要译得形神兼备，恐怕并非易事。

1.3 游移性

意义具有疏略与非确定特征，必然导致其游移化效果，使得人类语言中的意义具有无限能动性。意义游移性使人类可以寓意寄情赋予词语意义，如此，人就完全成了语言的主宰，而并非相反。所谓“词无本义，义随人生”体现出语言的人文性，也符合语言现实：语言具有极强的语境适应性、意义承载功能和替换功能。Это не тоска, а молодая бабья кровь заговорила. (这不是愁闷，而是年轻妇女的春情流露。)指称处于游移之中，意义便置于悬疑状态，指称与意义处在“似花还似非花”之间，恰好证明意义的游移性。

统观译学中意义的上述三种基本特征，译学视角的所谓“意义”应该作如下表述：意义是意指(означение)过程的产物或结果，意指过程是语言运用中对指称的观念化，观念外化为语言时含蕴的就是意义。可见，意义是语言运用中观念化了的指称，意义高于指称。

2 意义的表现论

所谓意义的表现论，即对意义获得途径的发掘与研究。翻译过程的意义获得或把握是个异常复杂的问题，不应该将其视为“看图索骥”式的操作。实际上，翻译学对意义获得的理论描写正是译学意义理论认识论的核心，也是意义表现论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意义获得的三个途径：符号系统、指称系统、语境系统。显然，这三个系统的分布与构建是对上述意义定义的演绎论证。

2.1 符号系统

就翻译而言，符号系统(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是意义获得的基本依据。译者只有通过对语言符号的操作——解码来获得意义，因此，语言符号不仅是依据，而且是意义获得的操作对象、手段和必经途径。翻译学意义理论的核心是剖析语言符号承载意义的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发挥功能的特定方式。

2.1.1 语言符号的无限性

语言符号具有指代(денот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所指意义)和 коннот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内涵意义))的功能。语言符号蕴涵意义是无限的，正如洪堡特所说的“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刘宓庆 2001: 351)词典中词义达十多项的词为数不少，特定语言符号可能指代无数个所指，真正指代的所指却只有一个，这种能指与所指关系必须在言语组合中才能体现出来。

内涵意义更难把握，经常受变幻的时空条件制约。стройка века(世纪工程)字面义指“伟大的工程”，但内涵意义却是“劳民伤财的”大型基建项目，含贬义：Депутаты не позволяют бездумно или по конъюнктурны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зарывать деньги в “стройки века”，пускать их на ненужный поворот рек。(代表们不允许不假思索或出于权宜之计将资金投入“世纪工程”，抛入无用的河湾。)

2.1.2 语言符号的驳杂性

语言反映社会现实，语言又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不同语言表达同一意义的方式手段必然驳杂多样。对翻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辨析同一指称原文语言符号的异同表述；其次，不同原文语言符号的同一指称如何用译文语言符号来表达。请见译例：Она весёлая девушка как праздник。(她是个开朗姑娘，人见人爱。)

2.1.3 语言符号的误导性

“语言符号具有指代功能，这种标记功能可以让人的感官获得某种提示。”（Гарбовский 2004: 87）因而有时可能成为“视觉迷雾”，使人产生错觉。这种误导性有两种情形：标记与意义不完全一致；标记与意义不一致。譬如：

（1）Золото, а не человек, лентяя и того приохотит к работе.（他真能干，连懒惰的人也被他发动起来，动手干活了。）

（2）Они знают, что хлеб есть валюта валют.（他们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

2.2 指称系统

相比语言符号，可以看出指称的本质特点：指称是实在的或质实的。指称总是与观念或实在相联，也可以说指称是意义的体现者。已如前述，意义高于指称，而且远比指称复杂。意义是一个多维的结构体，把握意义（及意向）就要分解这个结构体，析出它的多维意义。然而我们不能脱离指称或不顾指称，在“空中楼阁”中缘木求鱼。要分析意义结构，就要把握体现意义结构的指称系统。

2.2.1 超指称意义

意义高于指称，意义的场界远比指称宽泛，但指称一旦进入语境框架，具备相对确定的意向价值（иллокутивная ценность），即会获得较确定的意义，因为此时的指称已被语境观念化了。例如 Я хочу пить воды. 一句中的 воды, 一般指代的东西即分子式为 H₂O 的透明、无色、无味的液体物质，但句中 воды 的指称对象显然不可能是 сточные воды, грязная вода, ядовитая вода, инфекционная вода 等等，否则逻辑不通（“我”就不会“想喝”，这就是“意向”）。可见，句中 вода 的指称已是观念化了的指称，即“人可以饮用借以解渴的水”。语句意义是某种有意向参与的观念整合体，这正是句子与语句之间语义概念之别所在。

2.2.2 内涵意义（伴随意义）

意义的延伸变化经常不受指称的限制，超越其指称场界。“海上升明月”，“千里共婵娟。”“明月”和“婵娟”所指相同，涵义不同。后者含有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好、团圆”等涵义，前者仅指天体“月球”，即它的概念意义。同理，Душа России（俄罗斯之魂）中的 душа 与 душа и тело（灵魂与肉体）中的 душа 绝非同等涵义。

言者表示态度、观感或价值观，从而使概念意义得以延伸、附加的意义，语义学称为内涵意义或伴随意义，与所指意义或外延意义对应。内涵意义体现人际言语交流中的感应、感召作用，说明意义具有人文性。任何人都无法穷尽某一个词的全部内涵意义，它的随机性与开放性使这个词的所指意义千变万化。

2.2.3 情态意义

情态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词，包括情感也包括感情，还包括很多随机性的情绪变化，很多情感或感情都无法涵盖在简单的指称中，所谓“情动而辞发”讲的是情在字里，情在句间：“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字里行间的情感完全是超指称的。

把握情态意义涉及审美，情态含蕴常常需要“显影”，汉语修辞称之为“烘托”。这时最佳烘托背景是上下文，执着于一词一句的指称毫无意义。例如：Я знал красавиц недоступных, холодных, чистых, как зима.（我见过一些高不可攀的姑娘，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2.2.4 文化意义

社会文化可以赋予一个词、一个词组和句子完全超指称的意义。许多看似平常的词及其有关的指称，却蕴含着非常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Ну и собака на слово-то!（他可真能说！）（собака 在俄罗斯文化中可以指称“机智、伶俐”之人。）

指称流变常常源于文化流变，文化流变导致意义演变，此时的文化解读对于掌握意义至关重要。

2.3 语境系统

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关注语境对意义 (значение) 的意义 (значимость)。弗雷格认为“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涂纪亮 1996: 379); 维特根斯坦和奎因也明确提出“意义即应用”(周昌忠 1988: 234)、“意义取决于语境”(涂纪亮 1996: 284); 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重要依据就是语境。语境是某个词、某个句子、甚至是某种言语行为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时空条件。

2.3.1 语境对意义的决定作用

词语的适境, 即特定的意义适应于特定的语境, 这是双语意义转换的基本要求。语境是意义从模糊、游移、不确定进入精确、清晰、确定的固定因素: 微观语境决定指称意义, 宏观语境决定超指称意义, 微观语境与宏观语境都可以使词语意义情态化。

语境可以使意义意向化和情态化: 意义源于人的感性经验, 感性经验使人脑产生表象, 表象产生观念, 观念产生意义。词语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指称意义, 还提供了人脑中的意向, 这时, 言、景、意自然而然交织在了一起。

3 意义的对策论

所谓对策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性, 是意义转换的制衡策略。译者要把握意义必先把握指称, 翻译中常见的错误做法是: 1) 回避指称; 2) 不求甚解, 按字面定指称; 3) 不揭示句子与句子间的逻辑关系, 译成流散型语段(俗称流水句)。这里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1) 意义的能动性; 2) 意义的内在性; 3) 意义的外在性。

3.1 意义的能动性

意义的辩证观是既要看到其明确、限定的一面, 又要看到它模糊、非确定的一面。应该清楚: 几乎所有的词典、字典都只能记载每个词明确、限定的一面。这样就形成一种假象, 似乎意义都是明确的、限定的。然而语言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1) Движения этих морщин составляли главную игру его физиономии. (这些皱纹的活动便是他脸上的主要表情。)

(2) Он прожил жизнь беспримерную по фантастическим переломам и счастливой игре случайностей. (他的一生离奇曲折, 充满了机缘巧合, 可以说绝无仅有。)

3.2 意义的内在性

从译学角度审视意义的内在性, 就是按具体行文的意向来整合语义, 摆脱所谓“等值”、“等效”的陈规, 善于“选择”与“调整”以求得意义的对应转换。机械地表层对应只能是作茧自缚, 译者只有慧眼慧心, 通晓因势(势, 即作者的意向)制宜之术, 才能用译文语言重塑原文的艺术画面, 使语言交流达至跨文化、跨时空的终极目的。

“不拘一格”是顺势、通变的途径或手段, 也是顺势、通变的成果与特征。这里的“格”指原文的形式格局。翻译之大忌是死抱住“信”的形式标准, 不善于处理“离”与“即”的关系, 不懂得“若即若离”的妙理。

3.3 意义的外在性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一个哲学范畴, 也是事物存在的两个方面: 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并不存在的虚幻, 没有内容的形式是毫无意义的涂鸦。内容是存在的基础, 起主导作用; 但没有形式, 那么“内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时空条件和依托。正如列宁所说: “Форма существенна. Сущнос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а.” (Львовская 1985: 89) 一方面形式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另一方面形式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从译学视角来看, 形式分为“有意义的形式”和“无意义的形式”。无意义的形式形同虚设, 有意义的形式是对常规的变异, 蕴涵着某种意向, 正是我们关注的中心。кровавые волны (腥风血雨), волны мыслей (千思万绪), дождь

упреков (一片责难声), поток ругательств (无休止谩骂), 这些都是修辞性超常规搭配, 意象新颖脱俗, 翻译时需要审词度句, 不落窠臼, 做到形义贴切, 相得益彰。结构性变异更需注意, 处理不当, 结果便是形义剥离, 形不逮义: К молодым же принадлежали придворные мундиры, / кое-где украшавшие толпу. 试比较下句的两个译文:

(1) (在人群中有点显眼的、身穿宫廷制服的人, 就属于年轻派。)

(2) (属于年轻派的是身穿宫廷制服的人, 在人群中有点儿显眼。)

比较一下, 两个译文强调的重点不同, 原文的述题显然是 придворные мундиры。译文(2) 正确地传达出了原文的主题意义, 做到了形义相符。句子的词序是体现主题的“有意义形式”, 翻译时不可随意处理。

4 结语

借助语言哲学意义理论探讨翻译学中的意义问题, 应该重视语言运用中的意义, 重视人的因素。道理很简单: 语言是人的交际工具, 是思维(意义)传播的媒介, 这个媒介如果不能承载意义, 就是“非人文化”。语言最为本质的属性是人文性, 表现为承载人的思维(意义)与情感, 这是语言表意传情的基本功能。针对以意义对应转换为实质、而且必须依仗人的知、情、志的翻译而言, 所谓“同声相应, 同义相求”自是显然。如果说语言哲学层面的意义理论是静态观的意义论, 那么, 翻译视角的意义理论则是动态观的意义论。

附注

1 文中部分译例引自王秉钦著《语言与翻译新论》一书, 有些译文略作改动, 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Львовская З. Д. 1985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а [M]. М.: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 Гарбовский Н. К. 2004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M]. 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3] 刘宓庆 2001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4] 涂纪亮 1996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周昌忠 1992 西方现代语言哲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Meaning-based Translation Approach

XIE Yun-cai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Abstract: Linguistic meaning is problem in philosophy which has a long research history. It is also a basic problem in translation. Meaning should be induced by way of translation science and translation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expression and strategies.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meaning in translation may help us get rid of the restriction from traditional concepts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method and standard.

Key words: meaning; translation; epistemology; showing theory; game theory

收稿日期: 2008-10-15

作者简介: 谢云才 (1956-), 辽宁鞍山人, 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语义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